

《保保安氏纪功碑》刻立时间考释*

龙 圣

内容摘要:四川米易县落款为洪武廿五年的《保保安氏纪功碑》,以明代迷易千户所安姓土官正千户之口吻行文,又称明代建昌安氏世袭宣慰司。考之文献可知,明代迷易千户所仅设有贤姓土官(傣族)副千户,而无安姓土官(彝族)正千户,安姓至清代才获封迷易土千户;此外,明代建昌安氏世袭建昌卫土指挥使,并非宣慰司。清初,安氏曾短暂获封宣慰司,旋即降为长官司,后人误以为宣慰司之职乃是承袭旧制,故清中后期安氏一族文献中多有元明世袭宣慰司之说。凡此二者皆说明,《保保安氏纪功碑》为清代迷易安姓伪造。其动因可能有二:一为弥补明代迷易安姓历史记载之不详;二为清代安姓统治迷易的合法性寻求历史依据。该碑为清代伪造,故对明史研究的意义不大,但在研究清代社会史和补充正史记载不足方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保保安氏纪功碑》 四川迷易 彝族 傣族 移民史

《保保安氏纪功碑》,又称《萨连安氏宗祠碑》,因内容涉及明朝初年川南民族地区的开发而引起学界关注,一度成为探讨明初四川民族史和移民史的重要资料。长期以来,学界对该碑刻立的时间存在不同意见,不过大都认为它是明代之物。通过辨析前人观点和考订史料,本文认为该碑应刻立于清代,并就刻碑的原因及史料价值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保保安氏纪功碑》简况

《保保安氏纪功碑》最早由法国远征队队长亚陆讷(M.le commandant d'Ollone)于1907年在四川迷易(今攀枝花市米易县)萨连安氏土司衙署内发现,经上校雷柏茹(capitaineLepage)译成法文。1910年,亚陆讷以《从萨连碑看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明清屯堡社会变迁研究——以四川冕宁为中心”(项目编号:13YJC77003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3批面上资助项目“明清屯堡社会变迁研究——以四川冕宁为中心”(项目编号:2013M531583)的阶段成果。

獬人的大领主制》(“Stèle de Sa Lien, Constitution des grands Fiefs Lolos”)为题,将访碑经过、碑文及原碑拓片一同发表在《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第十编第十六卷上。抗日战争时期,该文被中国学者陆翔以《獬獬安氏纪功碑探访记》为题加以翻译和注释,并收录进开明书店出版的《国闻译证》第一册(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丛刊之二)中^①。从此,该碑逐渐引起我国学界的重视,但原碑一直下落不明。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米易县文管部门才在萨连中学一水沟边发现该碑,可惜当时已断为两截。为避免进一步的破坏,1982年在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队李绍明等专家的建议下,该碑被移交米易县档案馆保存^②。是时,李绍明先生对碑文进行了抄录和校对,并就该碑的相关情况向当地人士做了调查。因当地传说该碑先是立于安氏宗祠之内,后才被转移到安氏土司衙署,故陆翔所译《獬獬安氏纪功碑》也被后人称为《萨连安氏宗祠碑》^③。为避免民族歧视,论者将“獬獬”改为“保保”^④,故该碑又多以《保保安氏纪功碑》之名见于相关论著中。本文即沿用了这一名称。

碑文主要记载了元末明初刀姓(后改陶姓)土司帮助明朝平定云南以及阿姓土司(后改安姓)帮助明朝征服川南两事。后者为全碑重点,意在说明四川米易、建昌(今西昌)等地安姓土司是如何从云南来到当地并成为土司的过程。因此,该碑成为探讨明代川南土司制度、土司族属等问题的重要资料。

二、《保保安氏纪功碑》刻立时间辨析

关于《保保安氏纪功碑》刻立于何时这一问题,学界历来分歧较大,主要有“洪武说”“建文说”“正统以后说”“明中叶说”“明后期说”“明代说”六种观

①亚陆讷:《獬獬安氏纪功碑探访记》,陆翔译:《国闻译证》第一册,开明书店,第1-15页。

②李绍明:《米易县萨连土千户调查记》,李绍明、童恩正主编:《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报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印,1983年,第156-162页。该文修改后复以《傣族北上入川的实例——米易萨连土司的几个问题》为题发表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内容与原文基本相同。

③马云喜:《〈安氏土司纪功碑〉简介》,《渡口日报》1983年7月26日。

④民族史学界普遍认为,自元代以来“獬獬”一词成为我国西南地区彝族的统称。这一称谓在元明清时期的文献中有多种写法,如“獬獬”“猓猓”“猓洛”等。后人为摒弃其中的贬义,多去犬旁或改单人旁,作“罗罗”“保保”等,皆指今彝族。

点^①。其中,除“正统以后说”言辞含糊(不好断定下限)外,其他各说都一致认为该碑刻立于明代。而本文认为此碑应刻立于清代,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点,根据碑文“予世袭会川卫守御司迷易所正千户印务”,“其迷易地方,东至龙舟山顶,南至金沙江界,西至打冲河界,北至可郎、德昌界”,“予弟兄叔侄十二人赴京朝觐,叨受圣恩,勅予更为安姓,赐名伏成,所有弟兄叔侄,一例更为安姓,各名加御赏金皮勅书一道”的叙述可知,此碑是由迷易安姓正千户家族所刻立。但揆诸史实,明代迷易守御千户所(以下简称“迷易所”)只有土官副千户,而无土官正千户,且土官阿姓,后改贤姓,而非安姓。至清代,安姓才成为迷易所土千户,故安姓以“正千户”名义刻碑应在清代,而非明代。

关于迷易所土官设置问题,李绍明先生认为明代迷易所设有一正一副两位土千户,正土千户为安姓,副土千户为贤姓^②。但仔细考订史料,明代迷易所只有贤姓土官副千户,并无安姓土官正千户。兹将相关情况考订如下。

据[万历]《四川土夷考》记载,会川卫迷易千户所:“土官姓贤,远祖阿孩原籍云南景东府勐夷头目,因本处无田,带领夷民前来迷易趋田住种,洪武十六年随军征讨东川、芒部二府,杀贼有功,归附赴京,钦授迷易所世袭副千户。二世祖阿哀袭职,后除汉官一员到所公同管事,办纳秋粮、铺陈、驿马,后改为迷易长官司,改除副长官。永乐元年复设为所,进贡马匹,钦准仍袭副千户,子孙世袭不绝。今土官贤承爵住所城外,兵马单弱,地方东至本卫并建昌威龙司,南抵卫属黎溪州二里红卜苴勐夷界,西通盐井卫右所地方,北接建昌普济州界。”^③

可知,明初迷易所只设有土官副千户一名,其远祖阿孩是从云南景东府迁到迷易耕种的勐夷头目,后因帮助明朝大军征讨,被授予迷易所世袭副千户。民族史学界认为,“勐夷”又作“百夷”“摆夷”等,即今傣族。可知,明代迷易所

①主张“洪武说”、“建文说”、“正统以后说”、“明中叶说”的学者分别为亚陆讷、陆翔、何耀华、李绍明,详参李绍明《米易县萨莲土千户调查记》、《傣族北上入川的实例——米易萨连土司的几个问题》二文。“明后期说”,见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文物志》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53页。另有部分书籍并没有指出该碑具体刻于何时,只是笼统认为其刻立于明代,是为“明代说”,见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四川少数民族》,四川民族出版社,1958年,第94页;万世祥编:《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5页;《当代四川》丛书编辑部编:《当代凉山》,巴蜀书社,1992年,第22页;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民族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05页;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修订本编写组编:《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34页,等等。

②李绍明:《傣族北上入川的实例——米易萨连土司的几个问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③谭希思:《四川土夷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5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473—474页。此外,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三十四、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四等,皆有相类似记载。

土官副千户属于傣族土官。阿孩之后,二世祖阿哀袭职,虽中途职务有所变更,但不久又恢复原职,直到万历年间子孙仍世袭不绝。此外,《明宣宗实录》也有关于其二世祖阿哀的记载,宣德九年(1434)正月“戊戌,四川会川卫迷易守御千户所故土官副千户阿哀弟阿你等来朝贡马”^①,足以证明《四川土夷考》记载非虚。阿哀之后,仍有迷易所阿姓土官见诸史册。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十一年(1446)五月,“四川迷易守御千户所土官千户阿哀等贡马,赐彩币表里等物有差”^②。可见,从洪武至正统年间,迷易所土官副千户一直保持着阿姓。明中叶,阿姓改为贤姓。嘉靖年间,张时徽在其《芝园集》中便已记载有两位迷易所贤姓土官,一位是已经致仕的土官贤麒,另一位是在任的土官贤宗仁^③,可知最迟在嘉靖年间阿姓土官已改为贤姓。如前所载,此后的万历年间,又有土官贤承爵袭职。整理以上信息,可见一条残缺但较为连贯的土官世袭脉络:

阿孩(洪武)——阿哀(洪武、永乐)——阿哀(正统)……贤麒(嘉靖)——贤宗仁(嘉靖)——贤承爵(万历)

由此可知,明初至明后期只有贤(阿)姓一脉担任迷易所土官副千户,而无安姓担任迷易所土官正千户。那么,李绍明先生何以认为明代迷易所有一正一副两位土官千户呢?他指出:“文献记载,迷易千户所确有安、贤二姓土司,安氏土司系迷易守御千户所正千户,原为阿姓,《明实录·正统朝》即记正统十一年有米易守御千户所土官千户名阿哀者。[道光]《土司纪要》、[道光]《宁远府志》、[同治]《会理州志》均记该氏土司历史甚详。至于贤氏土司,系迷易守御千户所副千户,于此,《明史·四川土司传》、《四川土夷考》、《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皆有记录。”^④

在笔者看来,上述论断存在不少问题。第一,如果说明代米易千户所确实有一正、一副两位土官的话,为何《四川土夷考》、《蜀中广记》、《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輿纪要》、《明史》等明清书籍偏偏只有明代贤姓土官副千户的记载,却无明代安姓土官正千户的记录呢?副职尚有记载,正职反无记录,这不合常理。第二,《明英宗实录》记载的迷易守御千户所土官千户阿哀(李文写作

①《明宣宗实录》卷一〇八,宣德九年春正月戊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413页。

②《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一,正统十一年五月乙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794页。

③张时徽:《芝园集》别集奏议卷三《克平马罗番贼疏》,明嘉靖刻本。

④李绍明:《傣族北上入川的实例——米易萨连土司的几个问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阿哀”,误)^①,为何偏偏被认为是安姓土官,而不是贤姓土官?而且为何一定就是正千户?关于这点,李绍明先生并没有提供其他史料加以证明,而且就笔者管见,目前也无确凿的明代材料可佐证其判断。第三,[道光]《土司纪要》、[道光]《宁远府志》、[同治]《会理州志》确实有迷易所安姓土千户的记载,但只是记载了自康熙四十九年以来的历史,并没有提到他们在明代的情况,更没有说安姓土千户官职是从明朝延续下来的。接下来,笔者将对以上疑问展开具体的分析和讨论。

首先,正统年间的“迷易守御千户所土官千户”是否就等于“正千户”呢?本文不以为然。理由是,“土官千户”内涵不固定,既可能是土官正千户,也可能是土官副千户,正如明代的“卫指挥”一样,既可指“卫指挥使”,也可指“卫指挥僉事”“卫指挥同知”。同理,“土官千户”未必就是“土官正千户”,也可能是“土官副千户”。而且在明代史料中,“土官副千户”被笼统称为“土官千户”的例子并不少见。在此可试举几例说明,《明英宗实录》卷二〇一、二〇五、二八六记载的四川盐井卫“土官副千户刺直白”,在同书卷八二中亦称“土官千户刺直白”^②。《明宣宗实录》卷四、五所记云南腾冲守御千户所“土官千户张铭”,在同书卷六七中被记作“腾冲守御千户所土官副千户”^③。《明宣宗实录》卷十记载的“四川盐井卫土官千户阿抄”,同书卷五六又称其为“四川盐井卫故土官副千户阿抄”^④。《明英宗实录》卷三百所记四川盐井卫“土官千户卜阿佐”,在同书卷三〇一中又被称为“土官副千户卜阿佐”^⑤。张时微的《芝园集》卷一记载有迷易千户所“土官副千户贤麒”,同书卷三又称其为“土官千户贤麒”^⑥。可见,在明代官方文献中“土官副千户”被简称为“土官千户”的例子不少,因此不可见到“土官千户”字样便认为一定就是“土官正千户”,而必须结合语境和其他材料进行综合判断。如前所证,其他明清文献都只有明代迷易所贤(阿)姓土官

①关于正统十一年记载的迷易守御千户所土官千户的名称,因《明实录》版本不同而记载有异。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抄本记作“阿哀”,而广方言馆本、抱经楼本记作“阿哀”。因为宣德九年迷易所有“故土官副千户阿哀”,表明他在宣德九年就已不再担任土官职务,所以正统十一年土官当为“阿哀”,而非“阿哀”。台校勘本即以红格本“阿哀”为是(黄彰健:《明英宗实录校勘记》上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417页)。

②《明英宗实录》卷二〇一,景泰二年二月己亥,第4315页;卷二〇五,景泰二年六月丁丑,第4399页;卷二八六,天顺二年春正月癸未,第6131页;卷八二,正统六年八月壬申,第1638页。

③《明宣宗实录》卷四,洪熙元年七月乙未,第119页;卷五,洪熙元年闰七月壬子,第145页;卷六七,宣德五年六月戊子,第1583页。

④《明宣宗实录》卷十,洪熙元年冬十月乙未,第293页;卷五六,宣德四年秋七月辛亥,第1330页。

⑤《明英宗实录》卷三〇〇,天顺三年二月辛酉,第6365页;卷三〇一,天顺三年三月庚寅,第6387页。

⑥张时微:《芝园集》别集奏议卷一《建昌马罗疏》、卷三《克平马罗番贼疏》。

副千户的记载。结合这一背景,本文认为《明英宗实录》中的“四川迷易守御千户所土官千户阿衰”,实际上是土官副千户,而不是土官正千户。

其次,李绍明先生认为正统年间的土官千户阿衰是安姓土官,这点与史实也不相符。上文已证,阿衰实为土官副千户,自然当属贤姓土官,而非安姓。此外,从建昌、迷易等地土官改姓的历史情况看,阿衰也应该属于贤姓。理由是建昌及其附近地区在洪武年间就已经有安姓土官的记载,如洪武四年有罗罗斯宣慰使安普卜之孙安配率众归附明朝^①;洪武五年有罗罗斯宣慰安定归附^②。洪武十六年任建昌卫土指挥使的安配进京朝贡^③。洪武二十一年正月,建昌府故土官安思政妻师克等来朝贡马^④。同年二月,又有德昌府土官知府安住贡马^⑤。又碑文记迷易安姓始迁祖安伏成(阿汪呼)是建昌安普卜之叔,足见这一带安姓人的祖先早在洪武年间就已改安姓,那么正统时的“阿衰”就不可能是安姓土官。相反,贤姓土官是明代中期才改的姓,“阿衰”生活时代在改姓之前,故当属于贤姓祖先才是。

综上可知,正统年间的迷易所“土官千户阿衰”实际上属于贤姓土官副千户,而非“安姓土官正千户”。辨明这一问题,便可知有明一代,迷易所只有贤姓土官副千户,而无安姓土官正千户。换言之,明代迷易所没有土官正千户一职,迷易安姓也没有在当地担任过土官。试问,明代人怎么会把一个当时并不存在的“正千户”官名刻在碑上呢?因此,该碑不可能是明代所刻。

那么,安姓是何时当上迷易所土千户的呢?弄清这一问题,便能大致框定《保保安氏纪功碑》刻立的时间。据《清史稿》记载:“迷易土千户,其先安文,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⑥[雍正]《四川通志》又记载:“迷易土千户安世禄于康熙四十九年归诚授职,颁给土千户印信一颗,号纸一张。”^⑦两说中人名相歧,不知孰是,但至少可以肯定直到清朝康熙四十九年(1710),安姓才当上迷易所土千户。安世禄之后,又有其子安瑞鸣(亦作“安瑞明”)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承袭,“以故四川建昌道属迷易所土千户安世禄子瑞鸣袭职”^⑧。此后,又有安瑞图、安国泰承袭,至嘉庆年间被改土归流,同治年间承袭的安天佑只保留了

①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三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4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34页。

②《明太祖实录》卷七三,洪武五年三月壬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339页。

③《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二,洪武十六年二月丙申,第2387页。

④《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八,洪武二十一年正月乙巳,第2817页。

⑤《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八,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癸酉,第2828页。

⑥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五一三《土司传二·四川》,中华书局,1977年,第14240页。

⑦黄廷桂等:《四川通志》卷十九《土司·建昌道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5页。

⑧《清高宗实录》卷六六三,乾隆二十七年闰五月辛巳条,中华书局,第418条。

土司名号而已,“迷易所土千户安天佑,其先安文于康熙四十九年投诚授职,颁给印信号纸,历传安瑞明、安瑞图、安国泰承袭,于嘉庆十九年追缴印信号纸,改土归流,今袭职名”^①。综上所述,安姓在清朝康熙年间才当上迷易所土千户,取代了明代贤姓土官。这一变故,当与明清地方势力的消长变化有关。据[万历]《四川土夷考》记载,明代迷易所原有八百户“僂蛮”(傣族)。嘉靖年间,迷易所附近的马罗西番(藏族)势力壮大,不断对周边进行烧杀掳掠,贤姓土官势力由此衰落^②。至万历年间,贤承爵继任时已“兵马单弱”^③。入清后,康熙二十七年会川营阿所发动叛乱,迷易、黎溪、红卜苴等傣族土司亦叛服无常^④。故康熙四十九年,清朝在招抚这一带土司时立了彝族安姓为迷易所土千户^⑤,取代了势力衰微的傣族贤姓土官^⑥。从以上职官变动情况可知,迷易安姓以千户名义刻立《保安氏纪功碑》只可能在清代,而不可能在明代。

第二点,碑文中的“留守建昌卫所,世袭宣慰司”这一信息同样可以证明该碑并非刻立于明代,而是刻立于清代。

碑文提到“侄阿普卜威镇凉山,留守建昌卫所,世袭宣慰司”,但明代建昌安氏从未世袭宣慰司一职,而是世袭建昌卫指挥使。洪武十五年(1382),建昌卫设立^⑦。次年,阿普卜之孙安配已任建昌卫指挥使^⑧。至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安配以建昌卫指挥使致仕^⑨。五月,建昌卫月鲁帖木儿之乱爆发,平定后“安氏

①杨昶修,王继会纂:《会理州志》卷七《土司》,清同治九年(1870)刻本。

②张时徹:《芝园集》别集奏议卷一《建昌马罗疏》。

③谭希思:《四川土夷考》,第474页。

④黄廷桂等:《四川通志》卷十八下《边防·建昌道属》,第56页。

⑤关于迷易所安姓土千户的族属问题,学界颇有争议。据亚陆讷在20世纪初的调查显示,迷易所安姓土千户为“罗罗”(见《巍巍安氏纪功碑探访记》)。至今,米易安姓人的族别仍多为彝族。而李绍明1982年在米易调查时,从安氏后人安承宗口中得知“安、贤二姓原是一家,后才分开”,又因贤姓为傣族,便推测安姓也是傣族;又《纪功碑》记载建昌安氏与迷易安氏同族,于是进一步得出建昌安姓土司也是傣族的结论(见《傣族北上入川的实例——米易萨连土司的几个问题》)。相比之下,安姓为傣族之说建立在晚近对个人的访谈基础之上,而没有较早的资料可以证明,故不可信。关于这点,何耀华先生早有论述(参见氏著:《四川迷易萨连〈保安氏纪功碑〉质疑》,《文史》1982年总第15辑)。因此,笔者认为,清代迷易所安姓土千户实际上应为彝族,而非傣族。

⑥迷易贤姓傣族土司被取代后,其所辖傣族百姓或迁回云南原籍,或融入当地彝族、汉族当中。至1990年人口普查时,米易县傣族只有36人,分布在撒连、丙谷、垭口、宁华等乡镇。详参四川省米易县《米易民族志》编写领导小组:《米易民族志》,1992年,第116-117页。

⑦《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一,洪武十五年正月丁亥,第2224页。

⑧《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二,洪武十六年二月丙申,第2387页。

⑨《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七,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己丑,第3189页。

世袭指挥使,不给印,置其居于城东郭外里许”^①。安配以后,该职传六代至安忠^②,其间有四代人统治比较稳定,“查安氏世职以来,安华、安仁、安夷、安忠四世相承,谓夷犹多慑服”^③。至安忠承袭时,已到了明朝嘉靖末年,职务仍为“建昌卫土官指挥使”^④。安忠以后,连续出现好几代土官缺乏子嗣的现象,土官之妻与安氏土舍为争夺建昌卫土官指挥使一职多有矛盾,一度引起地方动乱,“配六世孙安忠无后,妻凤氏管指挥使事。凤氏死,族人安登继袭,复无子,妻瞿氏管事,以族人世隆嗣。世隆复无子,继妻禄氏管事。禄死,以族侄安崇业嗣。崇业与禄氏不相能,因养那固为假子,其奴禄祈从奥构难,岁仇杀”^⑤。文中安世隆为“建昌卫土官指挥使”^⑥,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身故。可见到了万历后期,建昌安氏仍为土指挥使。这一职务直到南明永历政权时期依然为安氏所承袭。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的《施田崇祀碑记》记载建昌卫有“土官指挥使安噜柏”^⑦;永历十年的《修古塔记》也有记载“土官指挥安噜柏、安泰宁”^⑧。直至顺治十六年,清军攻下大渡河以南地区,安泰宁才归附清朝^⑨。

综上,建昌安氏在明代从未世袭宣慰司,而是世袭建昌卫指挥使这一官职。据载,建昌安氏土官“所属有四十八马站,大头吐蕃、僰人子、白夷、麽些、洛鹿、保羅、鞑靼、回纥诸种类散居山谷间。北至大渡,南及金沙江,东抵乌蒙,西迄盐井,延袤千馀里。以昌州、普济、威龙三州长官隶之,有把事四人,世辖其众,皆节制于四川行都指挥使司。西南土官,安氏殆为称首”^⑩,足见其在明代之显赫。因此,该碑绝非明代所刻,因为当时人不可能弄错如此重要而且正是正在承袭着的官职。

相反,就笔者所见,认为建昌安氏在明代世袭宣慰司的说法恰恰都是清代才开始出现的。例如,[嘉庆]《宁远府志》记载:“河东长官司安玉枝,系云南人。明时随征月鲁帖木儿,留守建昌,授宣慰司。”^⑪又如[道光]《西昌县志略》

①《明史》卷三十一《四川土司传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8018-8019页。

②《蜀中广记》卷三十四《边防纪第四·上川南道》,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49册,第434页。

③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72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118页。

④张时徹:《芝园集》别集奏议卷三《克平马罗番贼疏》。

⑤《明史》卷三十一《四川土司传一》,第8019页。

⑥钱桓:《按蜀疏草》卷九《题参建南失事官员疏》,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

⑦佚名:《施田崇祀碑记》,凉山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州博物馆编著:《凉山历史碑刻注评》,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88页。

⑧佚名:《修古塔记》,《凉山历史碑刻注评》,第91页。

⑨《清史稿》卷五一三《土司传二·四川》,第14236页。

⑩《明史》卷三十一《四川土司传一》,第8019页。

⑪佚名:《宁远府志》卷二十四《土司志》,嘉庆年间修,1960年油印本。

记载：“河东长官司，其先自元迄明世袭建昌宣慰司。”^①再如[咸丰]《邛崃野录》记载：“护理河东女长官司安玉枝系沙骂阿磨基之次女、安武龄之妻，其先自元迄明世袭四川建昌宣慰司。”^②这些说法，与碑文“侄阿普卜威镇凉山，留守建昌卫所，世袭宣慰司”如出一辙。为何清代建昌安氏会被误认为元明世袭宣慰司呢？这与安氏在清初被授予的官职以及后人对这一官职的理解有关。

顺治十六年(1659)，安泰宁归顺清朝后被授予“河东宣慰司”。安泰宁死后，其子安承爵继承。承爵死后，其妻瞿氏代为管理印务。至雍正六年(1728)改土归流，安承爵之女安凤英承袭，由“河西宣慰司”改授“河西长官司”^③。此后有安世兴、安世裔、安玉枝、安正隆、安平康等袭职^④。由于时隔久远，清人对明朝之事记忆模糊，又因建昌安氏在清初担任过宣慰司，所以误以为这一官职是从明朝传下来的。刻于同治十三年(1874)的安平康墓志铭正好反映出这一点：“自其远祖普卜公于元至元十六年以师随征以来建，封镇国上将军，留守于此，世袭职官，统辖部落，历元迄明，至我朝授宣慰司原职。”“至我朝授宣慰司原职”^⑤，说明安氏子孙知道祖先曾在清初担任过宣慰司，但认为这一官职是“原职”，即原来就有的职务。换言之，即他们误以为宣慰司这一职务是从元明时期传下来的。

综上所述，建昌安氏在明代从未世袭宣慰司，而是世袭建昌卫指挥使。明代安氏族人不可能弄错这个当时正在承袭的重要官职。相反，清代安氏对明朝的记忆模糊，已不清楚其在明代的官职，且又受到清初承担过宣慰司这一经历的影响，才会误以为元明世袭宣慰司，直到清初。换言之，元明“世袭宣慰司”这一说法是清代才出现的。因此，该碑的刻立也就不应在明代，而应当在清代。

三、清代刻立《倮倮安氏纪功碑》的原因及史料价值

上文已辨明《倮倮安氏纪功碑》并非明代之物，而是清代所刻。那么，清代迷易安氏为何要伪造一通明代碑刻，这对其有何意义？结合碑刻内容和明清迷易土官变动情况来看，本文认为有两个原因不容忽视。第一，伪造该碑有增补明代安氏历史的意图。由前可知，明代迷易所土官为贤姓，而非安姓，故《四

①徐连：《西昌县志略》卷二《土司》，《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第5册，巴蜀书社，2009年，第41页。

②何东铭：《邛崃野录》卷七十三《西南夷类·土司》，《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68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759页。

③王先谦：《东华录·雍正十二》，《续修四库全书》第37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2页。

④徐连：《西昌县志略》卷二《土司》，第41页。

⑤叶廷植：《诰授武显将军安公墓志铭》，四川省编辑组：《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104页。

川土夷考》、《蜀中广记》、《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輿纪要》等书记载明代贤姓历史较详,却无安姓的记载。清乾隆年间编撰的《皇清职贡图》虽提到迷易所土千户安氏,但却弄错了迷易安氏的祖籍,称其“本滇之景东府摆夷种也”^②。据道光《土司纪要》记载,建昌安氏始迁祖安普卜“原籍云南大理府人”^③。此外,同治三年所刻的建昌土司安平康的墓志铭也记载“其先滇南之大理人也”^④,而迷易安氏始迁祖安伏成与建昌安普卜为叔侄关系,所以祖籍同为云南大理,而非云南景东。可见,诸书要么对明代迷易安氏缺载,要么记载有误。而《保俾安氏纪功碑》以祖先安伏成的口吻详细叙述了安姓人如何从云南大理定居迷易、建昌等地的历史。姑且不论这段历史是否真实,但就伪造碑刻这一事件本身而言,可以起到补充明代安姓历史的作用。第二,通过伪造碑刻将安氏编造成明代迷易所土官正千户,使其权势凌驾于文献记载的贤姓土官副千户之上,为其在清代统治当地的合法性作了阐释,有利于巩固其统治权威。

既然《保俾安氏纪功碑》为清人伪造的明代碑刻,那么我们对其史料价值问题也就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关于该碑的史料价值,此前学界大体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是基本否定,如方国瑜先生认为“迷易土署刻石所载,其土长自景东迁来,所说有本,惟此碑文为后人伪作,所说事迹多不可信”^⑤;胡庆均、何耀华认为该碑“谬误百出,兹不取”^⑥。第二种是辩证看待,如李绍明认为该碑“有不正确之处,但不失为一项极可珍贵的史料”^⑦。第三种是基本肯定,如唐嘉弘认为“碑文中对于安氏土司的源流及民俗学等均有宝贵资料”^⑧;杜玉亭认为该碑“具体史实叙述颇详”“记载也比较具体”^⑨。在笔者看来,前人因对此碑的年代判断存在较为严重的失误,故对其史料价值的评价也就难免有不当、不全之处。经考辨后,本文认为可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此碑的史料价值。

第一,该碑在研究明史方面的价值不高。该碑刻于清代而冒为明碑,其中所叙述的明代历史谬误不少。经何耀华考证,该碑不合史实的地方达十馀处之多,以至于何氏感叹说:“令人不可置信之点,几乎涉及该碑记述的所有史

②傅恒等:《皇清职贡图》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09页。

③转引自李绍明:《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成都出版社,1995年,第334页。

④叶廷植:《诰授武显将军安公墓志铭》,第104页。

⑤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526页。

⑥胡庆均、何耀华:《元初未设过罗斯土官宣慰使吗?》,《民族研究》1980年第5期。

⑦李绍明:《元罗罗宣慰司之后为河东长官司说质疑》,《李绍明民族学文选》,第337页。

⑧唐嘉弘:《凉山土司族属考》,四川大学学报编辑部、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四川地方史研究专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1页。

⑨杜玉亭:《元代罗斯土官宣慰使研究》,《民族研究》1982年第2期。

事。”^②尽管也有李绍明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碑中部分记载符合明代史实,但该碑仍有许多地方难以辨别真伪。更为重要的是,以晚出材料来研究早期历史具有一定的风险。这些因素决定了该碑在研究明代历史方面,价值有限。

第二,该碑是研究清代社会史的重要资料。碑刻造伪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我们也不能因为某碑是伪碑就完全否定其作为史料的价值。因为作伪本身也隐含了历史,如果我们能把造伪的相关情况考辨出来,则能发现其背后真实的历史。关于这点,陈寅恪先生早有精辟的阐释:“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③从这个角度而言,《保保安氏纪功碑》虽为清人所伪造,但亦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通过对该碑刻立时间的考辨,我们可以发现清人造伪背后所隐藏的地方社会的诸多细节,包括清代彝族安姓取代傣族贤姓成为迷易土司的现象;安姓成为土司后通过碑刻造伪增补其明代历史和巩固其清代统治权威的心态,等等。而这些社会细节在正史当中常常被忽视。因此,该碑在研究清代社会史和补充正史记载不足方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龙圣,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明清社会史、西南民族史。

②何耀华:《四川迷易萨连〈保保安氏纪功碑〉质疑》,《文史》1982年总第15辑。

③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80页。